

平埔族祀壺雜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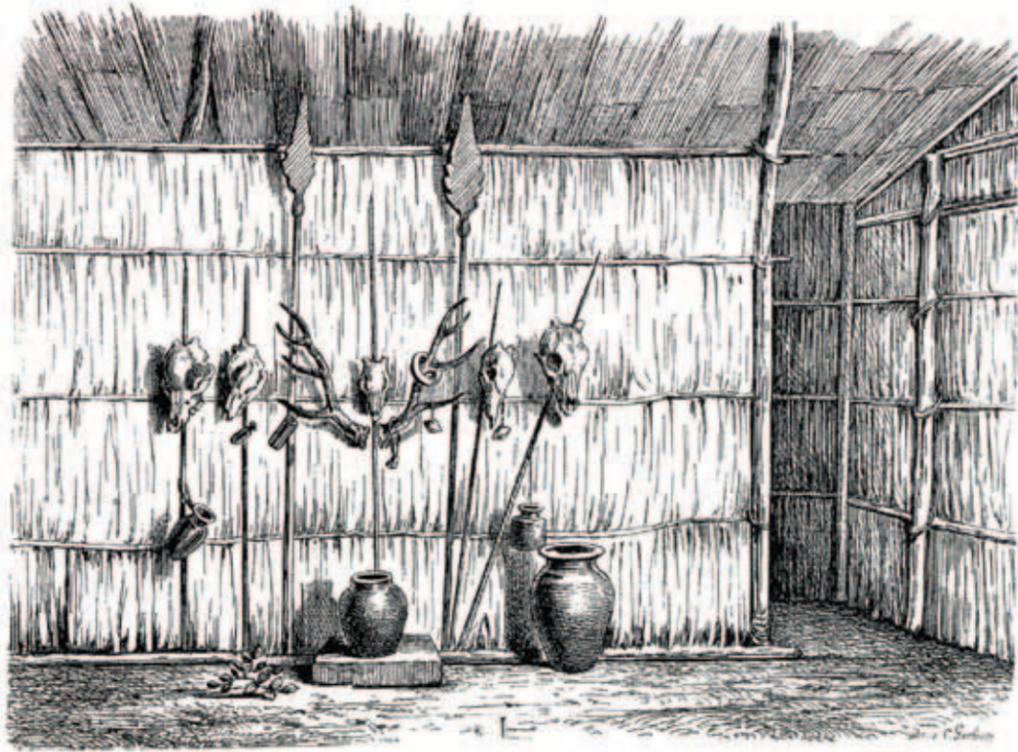
謝明良

臺灣西拉雅平埔族公廨祭壇所祭祀的神祇為阿日祖，又稱蕃太祖或蕃仔佛，並以各種質材的瓶罐壺甕做為祖靈的憑依處所。這些瓶罐壺甕的產地除了中國南方今日俗稱的「安平壺」之外，亦見來自歐洲的製品。

目前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展出的「履蹤—臺灣原住民文獻圖畫特展」（註一），展場一隅以一八七五年俄國海軍准尉 Paul Ibis 造訪頭社公廨時所圖繪的黑白速寫（圖一）為背景，搭配展櫃陳列的「安平壺」（圖二~四），利用透影手法頗具巧思地試著傳達臺灣西拉雅（Siriyá）即

今日習稱的平埔族住民公廨祭壇光景。（圖五）頭社是臺灣十七世紀荷蘭時代平埔族四大社系中目加溜灣（Backloan）社的支社，自目加溜灣逆曾文溪而上的第一支社，所以稱為頭社，其行政區劃屬今臺南市大內區。平埔族祭拜祖神所憑依祀壺的祭壇稱「Konkai」，一般相信其即黃叔

璫（一六八二~一七五八）《蕃俗六考》所記載的「公廨」。公廨祭祀的神祇為阿立祖（Arit），又稱蕃太祖或蕃仔佛（Fanput），頭社公廨位於頭社莊，現有建築為水泥瓦覆頂的磚牆小殿，是由之前木柱茅屋所改建而成。公廨內以材質不一、造型各異的瓶壺罐甕做為祖靈憑依處所，安平



圖一 1877年 頭社公廨速寫



圖五 「履蹤—臺灣原住民文獻圖畫特展」展櫃所陳列安平壺和背圖



圖八 安平壺 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第36號墓出土



圖九 安平壺 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第108號墓出土



圖十 Vung Tau Shipwreck打撈出水的安平壺

而沿用至今，是中國陶瓷史上唯一以臺灣地名命名而為各國學界通用的罕見例子。

此次特展展出的三件安平壺之器形大小各異，器壁有薄胎或厚胎者，器肩可見斜弧肩和折肩造型，口沿也有滿釉和露胎之別。從可大致判明相對年代的陸地遺址或沉船所見同類標本看來，圖二、三安平壺的

年代約在十七世紀，但和圖四造型相近之呈折肩、斜直筒身下置餅形假圈足的壺式，偶見乾隆朝（一七三六～一七九五）、甚至嘉慶朝（一七九六～一八二〇）年號刻銘（圖七），其雖屬燒成之後的後加刻銘，但不排除此式壺的年代有的可晚迄十八世紀。

（註三）

安平壺於中國的用途不明，前引

帶刻銘者則屬墓葬簡易墓誌、地券類代用品，但數量極少，應屬特例。另一方面，當安平壺做為盛裝什物的外容器運輸外國之後，遂出現消費地人們二次性利用的情況，其中又以臺灣考古遺址所見最為多元，除了城寨、住居遺址之外，平埔族以其為公廨祖神祀壺，宜蘭淇武蘭遺址曾用於墓葬陪葬物（圖八）；個別墓葬安平壺



圖四 安平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安平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安平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北頭洋公廨祀壺



圖七 「乾隆四年」刻銘安平壺 臺灣私人藏

壺即是當中常見的器類，其也是蕭壠（Soulang）社之臺南佳里北頭洋阿立祖神的祀壺之一。（圖六）國分直一根據北頭洋有懷抱壺神移往頭社的古老傳說，推測頭社公廨可能源自北頭洋。頭社公廨祭時多於瓶壺口沿部位繫紅布條如領結，內插芭蕉葉；北頭洋祀壺壺內盛酒及萱葉，壺前供奉甘蔗和檳榔。做為祖神神體的祀壺之數量不一，但蕭壠社系的蕃仔寮、蕃仔塭多為三件（註二），此次特展亦陳設

三件安平壺，不知是否基於以往田野調查報告的刻意安排？

安平壺的造型一般呈直口、平唇、斜肩或弧肩，肩以下弧度內收，平底或凹底。底足之外器表裏施灰白或微閃青色調的青白釉，口沿大多抹釉露出澀胎，是為因應口底相接擦疊燒造的必要措施，口沿滿釉者或是擦疊入窯時置於最上方的一件。從胎、釉和尺寸大小等外觀特徵看來，安平壺可明顯區分成數個組群，各組群的產地和年代不盡相同，但大致可確認其是由中國南方地區複數窯場所燒造，流行於十七世紀。「安平壺」一名則是緣自一九二〇年代以來臺灣臺南安平古堡一帶頻見出土，因地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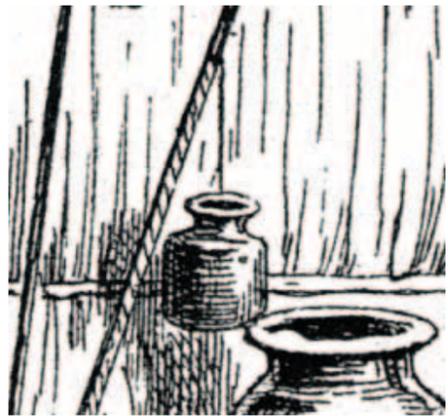
前引壺口彌封現象也有可能為防止內貯的酒或其他液態物外溢的必要舉措。惟所謂安平壺大小不一，既見高不足十公分的小品，亦見通高逾三十公分的大型作，尺寸懸殊，可知其不限於單一用途。日本長崎市竹町遺跡安平壺壺內填充鐵屑，而天草市河浦町出土的安平壺壺內置聖母瑪利亞造像、青銅十字架及念珠（圖十一）（註七），推測是十七世紀日本禁教時期所埋入，是安平壺二次性利用的有趣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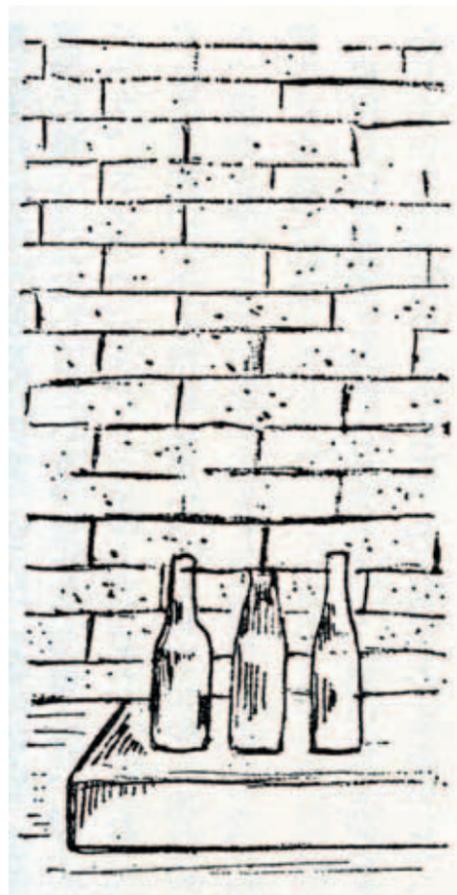
圖十五 折肩小罐 臺灣新北市林口鄉張新福氏採集



臺灣平埔族公廨祀壺的質材、時代和產地頗為多元，其雖以陶瓷為大宗，但亦見玻璃或金屬等製品。陶瓷種類不一，而以十七世紀以來中國南方地區窯場所燒造的壺甕、日本明治（一八六八～一九二二）以迄昭和（一九二六～一九八九）初期「德利」小口酒壺、佛壇花插，以及國府臺灣公賣局產銷的各式盛酒瓶罐較為常見。有趣的是，當一九四〇年代國分直一教授調查與頭社公廨祀壺息息相關的佳里北頭洋公廨時，目擊公廨除了供奉安平壺等之外，還可見到口沿部位施褐釉，瓶底帶「[Glasgow]」字銘的白瓷瓶（圖十二），同氏並且推測此或係與越洋貿易品有關的威士忌酒瓶。（註八）從近數十年來臺灣考古發掘或民間業餘愛好者的地表採集資料可知，類似的標本於臺南市熱蘭遮城遺址、新北市林口鄉太平村海邊等地都可見到。另外，日本長崎興善町（圖十三）、出島荷蘭商館長官別墅或汐留遺址等多處考古遺址亦曾出土類似標本，其中東京都汐留遺址殘瓶下方有「[GROSVENOR] / [GLASGOW]」橢圓形印銘，從而可知其應係英國格拉斯哥（Glasgow）地



圖十四 頭社公廨速寫圖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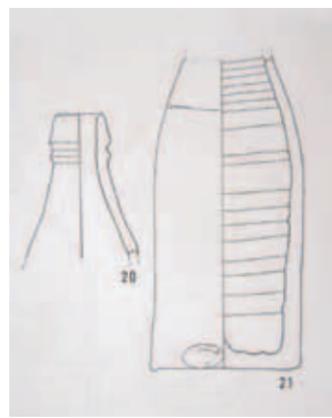
圖十二 北頭洋公廨帶Glasgow銘歐洲長瓶

北頭洋公廨帶Glasgow銘歐洲長瓶



圖十一 安平壺及壺內聖母瑪利亞像、青銅十字架和念珠 日本天草市河浦町出土

頸另見草繩繞纏（圖九）（註四），應該是針對內盛物的加封保護措施：越南頭頓海域一艘十七世紀沉船所見安平壺則是以黑色膠狀物包裹壺口，再以藤莖捆繞壺頸加固。（圖十）（註五）過去，陳國棟曾經提到江樹聲已懷疑法化退音（Jacob Valentin）說「三燒」（Sampsoe）即「中國啤酒」（Chinese Beer）的說法，因此在翻譯《熱蘭遮城日誌》時，將之譯成「麥酒」。陳氏在此一提示之上，結合西文「Shansoo」即「三燒」，也就是經過三次蒸餾的米酒的說法，認為安平壺就是《熱蘭遮城日誌》所載「燒酒」的容器。（註六）看來十七世紀荷鄭時期城寨遺址多見安平壺一事或許正是由於安平壺為酒壺之故，而



圖十三 歐洲長瓶 日本九州興善町遺址出土



圖十六 折肩小罐 日本東京汐留遺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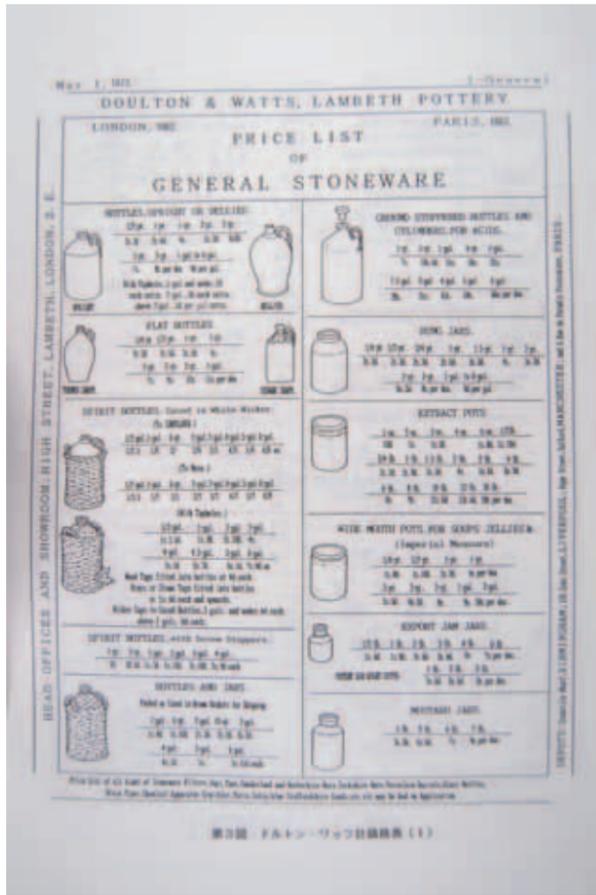
區製品，其相對年代在一八六九至一九二六年之間。(註九)此一年代於臺灣史上值清據至日本時代，是當時原住民將輾轉獲自清人或日人甚至歐洲人的歐洲製陶瓷瓶置入公廨祭祀的一例。

在此，本文想提示另一宗平埔族以歐洲陶瓷入祀公廨的可能案例。即前引Paul Ibs准尉於一八七五年造訪頭社公廨時提到：

在Tau-Sia (頭社) 的村莊裡我發現平埔族的宗教被保存下來。包括崇拜古老動物的頭殼和鹿角，那些都存放在一特別的小屋內。其中的一個就在村莊裡面。有一對頭殼，一個鹿角，兩個老矛，對稱的附著在

竹竿，故可推知頭社公廨鹿角上的環狀物應是手鐲。引起我注意的是迎面吊掛有手鐲的鹿角之最右側所豎立長竿，竿上有獸頭骨，頭骨下方亦即長竿中段部位另以繩繫掛一只折肩小罐。(圖十四)

從圖繪看來，小罐呈平口、束短頸、折肩、筒狀身腹造型。相對於其器形特徵少見於中國陶瓷，卻和新北市林口鄉太平村採集得到的口肩部位飾褐袖，身腹施白釉推測屬歐洲製品的殘罐頗有共通之處。(圖十五)從日本汐留遺跡、宮ヶ瀬遺跡、五島町遺跡或唐人屋敷町等遺跡出土的類似標本可以復原林口鄉標本之造型原是寬平口、以下內收置粗短頸、斜直折肩、筒形身腹，罐身下方橢圓印內有Powell / BRISOL字母。(圖十六)據此可知，這類折肩小罐應屬英國南西部港都William Power (& Sons) 製品，其相對年代在一八三〇至一九〇六年之間。(註十)其次，參照英國Doulton & Watts陶瓷公司於一八七三年所公告的炆器價目表(圖十七)，



圖十七 英國Doulton &Watts公司於1873年公告的炆器價目表

祭壇的牆上，跟彩色的石頭掛在一起。有幾個水瓶、裝了燒酒的壺，檳榔樹枝等，或豎立或擱置在前邊。那些是族人在其生命的重要時刻帶給聖物的祭品。另一個小屋在田裡，已是半毀的狀態。每個平埔族的人每個月必須用些東西祭頭殼兩次，通常是米、燒酒、檳榔或類似的東西。進屋時把帽子脫掉，把一口燒酒噴在祭壇上，在此同時彎

身鞠躬，然後把祭物放在祭壇前。這就是整個崇拜的範圍。在重要的冒險行動、婚禮、孩子誕生，以及人生所有的重要時刻，都要同樣的這麼做，並沒有祭師。(註十)對照前揭公廨速寫(同圖一)，可說是對公廨供奉物品種類和陳設方式等之簡要描述。由於平埔族新港社系知母義公廨既以鹿或豬頭骨獻祭阿立祖，並將手鐲、銀戒和檳榔吊懸於

則此類造型的鹽釉瓶可能是內盛果醬外銷的容器(Export Jar Jars)，但平埔族人則將其轉用為阿立祖神壇祀壺。頭社早在一八七〇年已設立基督

教會，但公廨內的歐洲果醬罐會不會是住民直接得自教會歐洲神職人員？目前已不得而知。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

- 註釋
1. 《履跡—臺灣原住民文獻圖畫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一三。
 2. 國分直一，〈Soulang (蕭壩) 社の末流を伝える地方〉，後收入同氏《壺を祀る村》，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一九八一，頁二四七—二五六。關於平埔族祀壺，另可參見：石萬壽，《臺灣的拜壺民族》，臺北市：臺原出版社，一九九〇。
 3. 謝明良，〈安平壺芻議〉，原載《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二，一九九五，收入《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文化，二〇〇五)，頁一八七—二〇〇。同書所補入〈後記〉，頁二一一—二一一。
 4. 陳有良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第四冊，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二〇〇八，頁一五五，圖一五五。
 5. Michael Flecker, *Excavation of an Oriental Vessel of c. 1690 off Con Dao, Vietna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and Underwater Exploration*, vol. 21, no. 3 (1992), p. 233. 另外，清楚彩圖可參見Christiaan J. A. Jöng & Michael Flecker, *Porcelain from the Vung Tau Wreck, The Haldstrom Excavation (UK: Sun Tree Publishing Ltd, 2001)*, p. 151.
 6. 陳國棟，〈「安平壺」與「三燒酒」〉，《臺灣文獻》，別冊八，二〇〇四，頁二一九。
 7. 仙台市博物館，《伊達政宗の夢—慶長遣歐使節と南蠻文化》，仙台市：慶長遣歐使節出帆四〇〇年・ユネスコ世界記憶遺產登錄記念特別展「伊達政宗の夢—慶長遣歐使節と南蠻文化」實行委員會，二〇一三，頁三三〇，圖二〇。
 8. 國分直一，〈ヘンズラーの様式を伝えていると思われる水瓶〉，原載《民俗臺灣》四〇，一九四四，收入前引《壺を祀る村》，頁三四五—三四九。
 9. 謝明良，〈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歐洲十九世紀炆器〉，《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臺北：石頭出版社，二〇〇八，頁三三—三三三。
 10. Ibis, Paul, "Auf Formosa: Ethnographische Wanderungen," *Globus*, 31 (1877), 中譯見：艾比斯，〈福爾摩沙：民族學遊記〉，收入：費德廉等編譯，《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臺北：如果出版社，二〇〇六，頁一九一—一九三及頁一九二圖。關於艾比斯的民族誌乃是承蒙「履跡」策展人蔡承豪博士的教示，謹誌謝意。
 11. 以上均參見前引《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歐洲十九世紀炆器》，頁三三三。